

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前途

——兼論清末民初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批評

中國應該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從 20 世紀初年開始，中國人便思考並辯論這一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重大問題。孫中山很早就表示了對社會主義的嚮往，因而也很早就受到了資本主義前途論者的批評。在辯論中，孫中山不斷思考，不斷探索，也不斷前進。儘管他一生都沒有超出主觀社會主義的水準，但他的有關思想中包含著應該為無產階級政黨所珍視的積極的、合理的內核。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孫中山民主革命事業的繼承者，而且正確解決了他提出而未能解決的社會主義前途問題。今天，當我們回顧近百年來中國人民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歷程時，應該承認，孫中山是近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驅宣傳家和思想家。

一、極思不能須臾忘記的“社會主義”

孫中山明確地表示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是在 1903 年。他在復友人函中說：“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¹當時，中國的先進份子處於不同的思想層次中。一種人，熱衷“排滿革命”，渴望“光復舊物”，“重見漢官威儀”；另一種人，以亞洲盧梭自命，沉醉於華盛頓、拿破崙的功業。孫中山超越上述兩種人，宣佈以社會主義為理想，顯示出他在中國革命前途這一重大問題上，具有遠大的目光，進行了深入的思考。1905 年，孫中山在比利時向國際社會黨（第二國際）執行局申請，接納他的黨，同時宣佈，將派代表出席下一屆國際大會。這一舉動，在當時中國的先進份子中，堪稱並世無二。它表明，孫中山企圖將中國革命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聯繫起來。此後，孫中山在《〈民報〉發

1 《孫中山全集》第 1 卷，中華書局版（下同，不一一注明），第 228 頁。

刊詞》、《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和《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公開闡明了自己的主張，民生主義這一概念開始震動中國的政治界和思想界。1912 年，民國建立，孫中山錯誤地認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兩項任務已經完成，因此，以無比的熱情進行“社會革命”的宣傳。他以“極端社會黨”自居，在南京、上海、武漢、廣州、北京、太原、杭州等地多次發表演說。不僅對社會各界和同盟會講，也對社會黨、統一黨、共和黨講，甚至還對黎元洪、袁世凱講。¹據報導，他還曾準備經營東沙島，“試行社會主義”。²這是他一生中宣傳社會主義的高潮時期。國民黨“一大”前後，孫中山的熱情再次爆發，社會主義又一次成為他演講中的鮮明主題。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他的有關宣傳也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內容和新特色。

孫中山開始革命活動的年代，自由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它的各種固有矛盾尖銳地表現出來。孫中山長期居留於歐美、日本等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症有相當透徹的了解。他多次指出，歐美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是一個極不平等的世界。1903 年，他在復友人函中就指出：“歐美之富者富可敵國，貧者貧無立錫。”³後來又說：“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⁴孫中山看出了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必定會引發激烈的階級鬥爭，社會革命必不可免。他說：“他日必有大衝突，以圖實劑於平。”⁵因此，他堅決主張，中國不應該走歐美老路。在《〈民報〉發刊詞》中，他說：“近時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躋跡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受列強欺負，躋跡歐美，曾經是許多愛國志士夢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孫中山卻從歐美強大的外表下看出

1 對統一黨演講見於《大共和日報》1912 年 4 月 17 日，各本孫中山集均失收；對黎元洪談話見於《申報》1912 年 4 月 14 日報導；對袁世凱談話見於《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第 123 頁。

2 《神州日報》，1912 年 6 月 19 日。

3 《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28 頁。

4 《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327—328 頁。

5 《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28 頁。

6 《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88—289 頁。

了“其民實困”的內相，毅然宣佈不能追逐別人“已然之末軌”，這在當時，是具有石破天驚意義的宣言。

孫中山看不起歐美事後所實行的改良政策，並由此上溯，批評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疏陋”。他說：“倘歐美早百年注意社會問題，而今日補苴罅陋之政策可不發生。甚矣！其疏陋也。”¹孫中山要求走自己獨特的道路。他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還未出生。但是，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必將加強勞工階級與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野。他甚至估計，十年以後，中國的大資本家總數將超過十萬人，其中有些人的財產，將超過美國的煤油和鋼鐵大王。孫中山不希望出現這種狀況，主張在堅決發展近代工業的同時，預為防範。他說：“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²對於這段名言，人們通常批評其為空想，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孫中山深刻地感到舊的一般民主主義革命（政治革命）的不足，要求在這一過程中解決社會革命的問題，防止資本主義“禍害”，使中國不僅成為“國民的國家”，而且成為“社會的國家”，創造出一種使歐美瞠乎其後，真正造福人民的社會制度，顯然，這一思想不僅對近代中國人民富於啟發性，而且包含著積極的、合理的內核。列寧所說，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傾向，“比民主主義的含義更廣泛”³，指的就是他思想中這種超出“民主主義”的成分。

對於資產階級，孫中山多次進行批判，指責他們不勞而獲，壟斷財富，壓制平民，流毒世界。他說：“資本家以機器為資本，壟斷利源。工人勞動所生之產，皆為資本家所坐享。”⁴“彼恃其財力，不惟足以壓制本國，其魔力並且及於外國。”⁵在孫中山看來，資本家的專制與專制政府並無二致，他說：“世界財力悉歸少數資本家之掌握，一般平民全被其壓制，是與專制政府何異？”有時，他甚至認為資本家的壓制比封建君主還要厲害。他說：“若專制皇帝，且口不離愛民，雖專橫無藝，然猶不敢公然以壓抑平民為職志。若資本家者，以壓抑

1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33頁。

2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頁。

3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0頁。

4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16頁。

5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72頁。

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基於此，孫中山曾將自己的民生主義稱為“排斥少數資本家”的主義。1912年，他並作過一個勇敢的預言：“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資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

孫中山不懂得剩餘價值理論，因而，他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只能藉助兩種方式：一、在資本家和封建君主之間進行歷史類比；二、像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訴諸於抽象的“理性”和道德觀念。這種批判顯示了孫中山對資本家的憎惡之情，它是震撼人心的，卻遠不是科學的、深刻的，無從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及其發生、發展、滅亡的規律。

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孫中山也持批判態度。他指責亞當·斯密的分配理論不合理，是為資產階級利益辯護的“舊經濟學”。他說：“按斯密亞丹經濟學，生產之分配，地主佔一部分，資本家佔一部分，工人佔一部分，遂謂其深合經濟學之原理，殊不知此全額之生產，皆為工人血汗所成，地主與資本家坐享其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析與多數之工人，則每一工人所得，較資本家所得，其相去不亦遠乎？宜乎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平民生計，遂盡為資本家所奪矣。”¹長期以來，亞當·斯密的理論一直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聖經明訓”，孫中山的批判雖然缺乏理論深度，但它畢竟刺去銳利的一槍，表示了對資本主義分配原則的抗議，也表示了對一種“新經濟學”的期待。

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大都把工人階級看作受苦受難、無所作為的階級。孫中山與之不同，他熱情讚譽工人階級對人類發展的巨大貢獻。他說：“當知世界一切之產物，莫不為工人血汗所構成。故工人者，不特為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²在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對立中，他真摯地同情工人階級，表示願為改善其處境而鬥爭。他說：“今坐視資本家壓制平民而不為之所，豈得謂之平等乎？”³不僅如此，他還充分肯定工人階級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認為“資本家所獲甚豐，皆由工人之勞動而來，工人爭其所應得之權利，

1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33頁。

2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39頁。

3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20頁。

亦理所當然。”¹由此，他進一步肯定“社會革命”，認為“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²但是，孫中山也還不能認識工人階級的偉大歷史革命，不懂得只有它才能創造未來社會。在這一根本點上，孫中山並未能超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水準。

對馬克思主義，孫中山也熱情讚譽。早在 1912 年，他就充分肯定馬克思“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統系之學理”。³1924 年，他發表《民生主義》演講時更進一步指出，馬克思的研究：“全憑事實，不尚理想”，使社會主義從烏托邦的空想發展為科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說：“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那〔哪〕一個人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⁴但是，這一時期，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有較大的發展，有識之士正在採用所謂“資本主義合理化”措施，實行局部調整和改革。例如，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發明的“福特制”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一些人因此提出：“不是馬克思，而是福特”給工人指出了幸福之路；“新資本主義”將消滅貧窮和危機。孫中山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些馬克思身後才出現的新情況，要求加以研究。他說：“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⁵甚至說：“在馬克思的眼光，以為資本家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併，自行消滅。但是到今日，各式各樣的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便可以證明馬克思的學理了。”⁶儘管如此，孫中山仍然主張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是好朋友，在中國，雖不可用“馬克思之法”，卻可以“師馬克思之意”⁷，態度是友好的。

1 《孫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91 頁。

2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版（下同），第 138 頁。

3 《孫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506 頁。

4 《孫中山選集》，第 807 頁。

5 《孫中山選集》，第 822 頁。

6 《孫中山選集》，第 820 頁。

7 《孫中山選集》，第 842 頁。

思想家的理論原則和實踐綱領之間常常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當思想家馳騁於想像的領域時，他可以無所顧忌，恣情任意，但是，當他腳踏實地時，就不能不考慮到各種現實的條件和因素，據此而制訂的實踐綱領就不能不受到制約，和理論原則之間的差距也就拉開了。在理論原則上，孫中山讚賞土地公有和資本公有，認為二者“得社會主義之真髓”¹，但是，在實踐綱領上，孫中山卻只主張以實行地價稅為中心的平均地權和大資本國有。孫中山認為，實行了這兩項也就是實行了社會主義。

孫中山期望在實行了他的社會主義後，中國不僅富強，而且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成為“至完美”的國家。他天真地設想，那時將不是“患貧”，而是“患富”的問題。他說：“數年後民生主義大行，地價、鐵路、礦產各種實業俱能發達，彼時將憂財無用處，又何患窮哉！所謂教育費、養老費皆可由政府代為人民謀之，夫然後吾黨革命主義始為圓滿達成，中華民國在世界上將成為一安樂國，豈非大快事哉！”²孫中山設想，在這個“安樂國”裏，政治民主，實業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之上”，勞工將在優良的條件下工作，不僅獲得“其勞力所獲之全部”，而且將“知識日進，獲得充分之娛樂與幸福”。³

為了補償生產中消費掉的生產資料，擴大再生產，發展文化、教育、衛生等公益事業，支付管理費用，因此，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勞動者也不可能獲得“其勞力所獲之全部”，但是，在孫中山的這一提法中，顯然彌足珍貴地包含了反對人剝削人的思想。

孫中山不理解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在國家政權中掌握領導地位的必要，讚賞公有制而又不明確提出以之為主體，也不懂得科學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這樣，他所構思的“安樂國”當然遠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但是，也顯然越出了資產階級一己私利的狹隘樊籬。列寧說過：“‘靠犧牲別人來經營’這一事實的存在，永遠會在被剝削者本身和個別‘知識份子’代表中間產生與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⁴孫中山一類懷著救亡熱誠投身革命的知識份子，自身不佔有

1 《孫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518 頁。

2 《孫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74 頁。

3 《孫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92 頁。

4 《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列寧全集》第 1 卷，第 393—394 頁。

生產資料，經常以“平民”的代言人自居，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充分暴露，工人運動已經相當強大的情況下，產生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是很自然的。

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其獨特的個性。就其批判資產階級、抗議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同情工人階級、讚賞公有制等理論原則看，它接近於空想社會主義，但是，就其實踐綱領看，則是一種“混合經濟”：以發展國有制為主，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在不損害國計民生的條件下適當發展（下文詳論）。

當孫中山構思他的“安樂國”時，世界上還沒有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勝利後，孫中山以極大的興趣注視並研究俄國的情況。1920年11月，他在廣東省署演說：“此次俄國革命後，實行社會主義，俄國遂釀成一種好風氣。”¹此後，他對俄國社會制度的讚美日益增多。1924年2月，他對駐廣州湘軍演說，聲稱“現在的俄國，什麼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大公司之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²這樣，孫中山長期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有了一個具體形象，從而具備了突破主觀社會主義的可能。遺憾的是，孫中山逝世得太早，未能踏入這個飛躍過程。

二、資本主義前途論者對孫中山的兩次批評

在歐洲，共產主義的“怪影”曾使資產階級長期驚悸騷動；在中國，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也使許多人不安。清末民初，資本主義前途論者對他的民生主義進行過兩次批評。第一次在1906—1907年，代表人物為梁啟超，範圍限於《新民叢報》。第二次在1912—1913年，代表人物為章太炎、孫武、張振武、金天羽、藍公武，涉及的報刊有上海《大共和日報》、《民聲日報》、《神州日報》、《獨立週報》、武昌《大漢報》、北京《亞細亞報》、《國民公報》、《燕京時報》、天津《大公報》等。兩次批評提出的問題都較多，而其核心則在於中國的前途。由於梁啟超的第一次批評已為人們所熟悉，本文將著重闡述第二次批評的情況。

1 《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30頁。
2 《孫中山選集》，第887頁。

1. 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遙遠的、不能實行的理想。梁啟超稱：對於“社會改良主義”，他絕對表示同情；對於“麥喀、比比爾輩”所宣導的“社會革命主義”，他認為“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數百年之後”。¹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的批評者們持論大體與此相同。1912年1月，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聯合會第一次大會上說：“近年對於民生問題，頗有主張純粹社會主義者，在歐洲程度已高之國尚不適用，何況中國？”²稍後，金天羽也在《大共和日報》上撰文稱：“此華嚴之世界，能否湧現於短期之世紀中，雖起瞿曇、基督而揲著以求，猶不能以預測，則謂之哲人之理想而已。”³孫中山所宣導的，並不是馬克思的“純粹社會主義”，批評家們可謂庸人自擾，不過，這倒暴露了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真實態度。

2. 認為社會主義不適合於人類心理。梁啟超稱：“經濟之最大動機，實起於人類之利己心。”⁴金天羽繼稱：“人類之生，固扶利己之心以俱來。”章士釗等創辦的《獨立週報》也稱：“所謂興公產地，所謂廢私人之資本也，其果合乎人類之心理乎？”⁵地主階級是諱言利己的，他們習慣於把本階級的狹隘利益包裹在光華四射的禮義外衣中，赤裸裸地宣佈利己主義為人類與生俱來的心理，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方式和資產階級語言。

3. 認為社會主義將產生新的專制。梁啟超提出，社會主義必以全國為“獨一無二之公司”，“取全國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執職業，一切干涉之而負其責任”，結果必然濫用職權，“專制以為民病”。⁶金天羽發揮了這一思想，他稱資本主義為“黃金專制之局”，認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只是“破一專制而復產一專制，且其所專者又更甚焉”。其理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掌握生產機關，因而也掌握利益的分配，必將導致國家權力的膨脹和特權者的產生。他說：“然而所謂分配之者，顧誰為分配乎？非小己之享特權者乎？國家之權

1 《雜答某報》，《新民叢報》第86號，第48頁。
2 《大共和日報》，1912年1月5日。
3 《社會主義之商榷》，《大共和日報》，1912年4月13日。
4 《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新民叢報》第91號，第5頁。
5 夢漁：《論社會主義》，《獨立週報》第27號。
6 《雜答某報》，《新民叢報》第86號，第23—24號。

干涉將無限域而至於筐篋，試問專制君主曾有是乎？”¹ 社會主義民主本質上是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當家作主，但是，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民主形式，在它的實踐過程中，確實可能出現權力過分集中、管得過死、包得過多、一言堂以至個人專斷等違反民主的現象，這是必須認真對待，努力加以解決的。但以為社會主義必然會產生新的專制局面，不過反映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恐懼心理而已。

4. 認為中國貧富懸殊不大，不必實行社會主義。《大共和日報》稱：“中山先生之提倡社會主義者，乃見美國貧富至不平均，鐵道大王、石油大王之權力較專制君主為尤甚，唯恐中國人民遭此荼毒。此仁人之用心，記者敢不敬佩，但此乃美國之社會現象，中國今日無有也。” 文章要求孫中山“詳察中國之人情時勢而後規劃中國前途，幸毋拘泥習見，無理效顰。”² 原屬同盟會的武昌起義元勳張振武也激昂地提出：“諸君試思，今日我國程度若何，有美國之托拿斯等弊否？”³ 這一批評貌似有理，然而孫中山有自己的解釋：與其臨渴掘井，何如未雨綢繆？等到鐵道大王、石油大王出現再革命，就晚了。

5. 認為從中國當時政治形勢看，不適合進行社會革命。孫武稱：“中國政治革命尚未完成，社會秩序尚未恢復”，只能“興教育，礪知識”，才能挽救國家危亡。⁴ 又稱：“武昌起義係政治革命，現在各黨互生意見，萬不可再說社會革命，貧富亦萬難均等。現在外人尚未承認，各省紛爭日甚，吾輩實社會之罪人也。”⁵ 清朝統治的推翻不等於民主革命的勝利，在這一意義上，孫武的“政治革命尚未完成”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把革命黨人的任務限於“興教育，礪知識”等方面，同樣也不能使“政治革命”趨於完成。

6. 認為中國的急務是發展資本主義，而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藍公武稱：“今欲救濟現社會之苦痛，須改良現社會之組織，使人各得以知識能力，自由競爭，而享其勞力之結果。”⁶ 顯然，這種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競爭”乃是自

1 《社會主義之商榷》，《大共和日報》，1912年1月5日。
2 相如：《敬告孫中山先生》，《大共和日報》，1912年4月15日。
3 《共和黨成立會記事》，《大公報》，1912年6月3日。
4 《漢口專電》，《神州日報》，1912年4月14日。
5 《武漢與孫中山》，《民聲日報》，1912年4月16日。
6 《論均貧富之社會主義》，《國民公報》，1912年4月28日。

由發展資本主義的同義語。辛亥革命前，梁啟超曾提出，當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的批評家們也都異口同聲。《大共和日報》和《大公報》斷言：“救貧療飢之上藥，道在獎富民殖產之野心，使人人胥有猗頓、陶朱之希望，取前朝束縛商工之苛例，掃蕩而廓清之。” 它們批評孫中山的“社會革命”思想是“無病呻吟”，“徒以灰國民進取之雄心，而擁有厚資者，人人胥懷自危之念。”¹ 武昌《大漢報》論證世界各國的富強之道在於“以拓殖為經”，以農、工、商、工藝為主體。它說：“我中國現今之最要政策，不惟懼貧民之多，且甚懼富民之少；不惟懼貧民不能富，且甚懼富民之日即於貧；不懼因獎勵企業而令托拉斯之發生，而懼因社會主義而令專制之復活。”² 《民聲日報》也稱：“今日吾國實業衰落，急當獎勵資本家以開發富源，不當以社會主義過為遏抑。”³ 他們步武梁啟超的故轍，力圖從和外資競爭的角度論證中國大資本家出現的必要。金天羽說：“吾國素無煤油、鋼鐵、電器、鐵道諸大王，奮焦僂之臂以搏巨靈，其勝敗雖愚者知之。然則吾國之於資本家焉，方存乎見少，又安可張均一分配之學說，乘豪富之未萌而預摧其蘖哉！”⁴ 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很微弱，孫中山的批評者們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是符合歷史要求的；他們以民族資本主義抵禦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思想也不無道理。但是，他們輕視勞動人民的利益，不考慮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長遠後果，既是狹隘的，又是短視淺見的。

7. 反對土地國有和單一稅政策，認為只著眼於土地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梁啟超稱：“夫歐美現社會所以杌隉不可終日者，曰惟資本家專橫故。使徒解決土地問題而不解決資本問題，則其有以愈於今日幾何也！”⁵ 在辛亥革命前，孫中山一直忽視資本問題，應該承認，梁啟超的批評頗中肯綮。但是，梁啟超卻既反對解決資本問題，也反對解決土地問題，他認為私有制度是“現社會一切文明之源泉”，土地國有是一種“掠奪政策”。⁶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

1 《社會主義平議》，《大共和日報》，1912年4月18日；《大公報》，1912年4月15日。
2 觀棠：《論天與聖皆主張均產而猶有憾》，《大漢報》，1912年4月29日。
3 一羽：《與〈民立報〉商榷》，《民聲日報》，1912年4月17日。
4 《社會主義之商榷》，《大共和日報》，1912年4月13日。“方存乎見少”，此處當有誤植。
5 《雜答某報》，《新民叢報》第86號，第34頁。
6 《再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新民叢報》第90號，第22頁；91號，第5頁。

前曾主張“均配土田，使耕者不為佃奴”¹，辛亥革命後卻和張謇等沆瀣一氣，認為“土地國有，奪富民之田以與貧民，則大悖乎理，照田價而悉由國家收買，則又無此款，故絕對難行”。²又說：“其專主地稅者，尤失稱物平施之意。此土本無大地主，工商之利，厚于農夫，培多益寡，自有權度，何用專求之耕稼人乎？”³章太炎這裏所說的“耕稼人”，實際上是地主。關於這一點，金天羽表述得更清楚，他說：“以全國之政費而累累於地主之肩，天下專制不平等，寧有過於此者哉！”⁴儘管土地國有一類主張是資產階級激進思想家提出來的，但是，由於資本家們害怕因此牽動資本的所有權，因此，從來沒有哪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全面實行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和封建主義關係密切，既要發展資本主義，又要保護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在他們的言論中出現為地主階級呼籲的聲音，並不奇怪。

8. 認為社會革命會導致秩序混亂，甚至國亡民死。孫武稱：“社會主義須從學理上研究，武漢人民恐尚無此程度，倘人民誤解，視奪人財產，擾亂社會秩序為社會革命，則極為危險。”⁵《民聲日報》稱：“若必以貧富均等為言，則富者無企業之心，貧者有依賴之勢。極其流弊，則社會相陵，眾暴寡，小加大，是率天下於劫奪之途，社會秩序必將破裂而不可收拾。”⁶幾乎所有的孫中山的批評者都認為，中國此後的“暴動風潮”將日盛一日，其結果不堪收拾。⁷張振武稱：“如提倡社會主義，將使遊手好閒之輩，人人胸中有均財思想，誠恐中國不亡於專制政治，而將亡於社會主義也。”⁸北京的《燕京時報》更危言聳聽地說：“今中山先生乃欲舉天下人民，悉均其貧富焉，揆諸天演公例，既與優勝劣敗之旨相違；徵諸人道公平，復與安分循理之情不合。演成第二革命之慘劇，同室操戈，燃萁煮豆，元氣已經剝喪，毒劑又復進行，舉四萬萬同胞，無富無

1 《五無論》，《民報》第16號。

2 《大共和日報》，1912年1月5日。

3 《復張季直先生書》，《大共和日報》，1912年1月6日。

4 《社會主義之商榷》，《大共和日報》，1912年4月13日。

5 《專電》，《中華民國報》，1912年4月14日。

6 一羽：《與〈民立報〉商榷》，《民聲日報》，1912年4月17日。

7 《社會主義之商榷》，《大共和日報》，1912年4月13日；參見《論兵變與生計學之關係》，《大公報》，1912年6月26日。

8 《共和黨成立紀事》，《大公報》，1912年6月3日。

貧，同歸於盡，則中山先生所謂均貧富一言，非以利民生實以促民死也。”¹孫中山主張消除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懸殊的現象，但並不提倡平均主義。上述言論，既有對孫中山思想的誤解，也有對下層人民的恐懼，但更多反映的則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於一個安定局面的要求。

可以看出，兩次批評在理論上是一貫的。批評者們強烈地反對孫中山的“社會革命”思想，反對社會主義前途，以典型的資產階級心理和語言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次批評聲勢較小，僅限於一人一刊；第二次則涉及四五個主要城市的十餘種出版物，孫中山在武漢和廣州演說時，都有人當面反對。²其次，第一次批評的主角是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梁啟超，而第二次批評的主角除原屬於改良派的藍公武外，幾乎都是孫中山當年的戰友。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

辛亥時期的知識份子是一個複雜的群體。就對清政府的態度而言，有革命與改良之分；就對資本主義的態度而言，則有肯定與批判之分。辛亥革命勝利了，原來革命、改良的界限不再存在，因此，在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上重新分化組合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民國建元之初，資產階級喁喁望治。他們嚮往著自此可以擺脫各種拘牽，大展宏圖，真正出現“生意興隆”、“財源茂盛”的局面。在這一情況下，孫中山的“社會革命”思想自然不會受到歡迎。儘管孫中山小心翼翼地上海資本家面前聲明：“資本家當維持，如何反對？特資本家之流弊，則不能不防備。”³但是，這種低調的“維持”論抵消不了高調批判的影響，所謂“防弊”之說也不合資本家的胃口。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成了新時期“暴烈”派的象徵。不僅眾多的輿論反對他，當年的反滿戰友也紛紛和舊日的改良派、立憲份子合作，樹幟立黨，與同盟會抗衡。章太炎參加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力辯“社會主義”和“社會政策”之間的區別，以“採用穩健社會政策”，“維持現行私有制財產制”相

1 焚筆：《論孫中山民生主義》，《燕京時報》，1912年4月27日。

2 在武漢，孫武當面反對，見《神州日報》及《民聲日報》1912年4月14日《漢口專電》；在廣州，一個叫區敦夢的記者當面反對，見《神州日報》1912年5月11日報導：《民生主義大討論》。

3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頁。

號召。¹ 孫武等人組成的民社則挑戰式地向孫中山提出：“現時中華民國適用國家主義乎？抑適用社會主義乎？”他們的結論是適用“國家主義”。²1912年5月，民社、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等組成共和黨，也繼續以此為“黨義”。這種新的抗衡反映到輿論上就是前述《大共和日報》、《民聲日報》、《大漢報》等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批評。

一種理論，必須反映現實的需要，而又和一定的階級力量相聯繫，才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民生主義，由於既脫離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又脫離農民，因此，支持者始終寥寥。這種狀況，直到發展為新民生主義之後，才有所改變。

三、新三民主義通向社會主義

儘管孫中山一生都沒有超出主觀社會主義的水準，但是，他的不倦的追求卻使他在晚年提出了新三民主義，並與中國共產黨人合作，這就使新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得以聯通。

如所周知，孫中山的土地思想主要淵源於亨利·喬治。亨利·喬治激烈地攻擊土地私有制，提倡土地國有，但是，在具體措施上，他卻認為沒有必要實行土地國有。這就從原來的理論原則上後退了。同樣，孫中山也主張土地國有或公有。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私人對土地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主張摧毀封建土地關係，“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³同盟會時期，他又進一步提出：“土地就等於空氣一樣，應該為大家公共享受，所以土地不能歸諸私人，而應歸之國家所有才對。”⁴他的戰友們並設想，在此基礎上，消滅“地主強權”，使“勞動者有田可耕”，“國內人人皆為租地者”。⁵但是，基於減少阻力的現實考慮，孫中山也從這一原則上後退了。綜合孫中山的全部言論，他的平均地權

1 《特別啟事》，《大共和日報》，1912年1月3日；《聯合會政黨紀事》，《大共和日報》，1912年3月4日。

2 《民聲日報》，1912年4月19、20日。

3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頁。

4 馬君武：《孫總理》，《逸史》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

5 民意：《告非難民生主義者》，《民報》第12號，第101頁。

的主要內容是：由地主自報地價，國家按值百抽一的比例課取地稅；原價歸地主所有，因社會進步而產生的增價則歸國家所有，為國民共用，作為社會公益之用；國家並可根據需要隨時按原價收買之。孫中山認為此法既可使國家掌握大量財富，又可使國家廉價獲得土地，是一項有利於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他說：“地為生產之要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即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¹

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理論防止地主利用土地增值成為暴富，有剝奪地主所有權的部分，但是也有保留地主所有權的部分。在土地未被收買之前，地主只要按規定向國家交納地價稅，便仍然可以佔有原來的土地並收取地租。因而，它是一個折衷的、溫和的改良主義方案。至於按價收買，孫中山於1912年明確表示：“土地國有之法，不必盡收歸國家也。若修道路，若闢市場，其所必經之田園廬墓，或所必需之地畝，即按照業戶稅契時之價格，國家給價而收用之。”²由於孫中山所要買取的土地主要是為了解決工商業的建築、經營和交通用地，因此，必然集中在城市繁盛之地及交通線上，對廣大農村的地主階級並不構成嚴重威脅，也不反映農民迫切的土地要求。晚年，孫中山公開提出蘊蓄多年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這才使“平均地權”這一主張具有了徹底摧毀封建土地制度的內容。

在資本問題上，孫中山同樣也有一個漫長的探索過程。

最初，孫中山主張聽任資本主義自由發展，認為“工商廢居有巧拙，而欲均貧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³。《民報》時期，馮自由、朱執信、胡漢民等人的文章中已經有了鮮明的大資本國有思想，孫中山對此卻無所表述。直到1911年之後，孫中山的有關言論才突然增多。當年7月15日，他在美國舊金山演說，聲稱革命之後，要將“礦務、鐵路歸為國有”。⁴1912年4月1日，他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上提出：“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道、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

1 《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21頁。

2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55頁。

3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頁。

4 《少年中國晨報》，1911年7月15日。

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¹4月4日，他向上海《文匯報》記者表示：“民國政府擬將國內所有鐵路、航業、運河及其他重要事業，一律改為國有。”²其後，孫中山陸續宣佈應歸國有的範圍還有森林、礦產、製鐵、煉鋼、海港、郵政、自來水、瓦斯及“一切公共事業”等。孫中山設想，國有企業的利潤將完全歸社會公有，由大家共用，這樣，“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³孫中山將這一政策稱為“國家社會主義”或“集產社會主義”。《民報》時期，梁啟超曾譏笑孫中山只解決土地問題，而不解決資本問題，如同一個人朝衣朝冠卻不鞋不襪。現在，孫中山的視野進入了資本領域，捕捉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它表明，孫中山和企圖掩蓋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亨利·喬治不同，是在真誠地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雖然主張大資本國有，但並不反對私人興辦有關事業。他曾提出，在最初階段，鐵路可以允許民辦，以利競爭速成，而在40年之後，則以法律無償收歸國有。⁴關於礦業，他也有類似設想。⁵孫中山把這種辦法稱之為“民辦國有主義”。同樣，他也不反對外資輸入，相反，卻積極主張改變閉關自守狀態，實行開放主義，在不損害國家主權的條件下允許外人開辦礦山、鐵路等事業，但是，都必須立定期限，屆期收贖，甚至提前收贖。孫中山把這種辦法稱之為“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⁶

很長時期內，孫中山的言論重點在於批判資本主義禍害，未能提出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明確方針。直至1918年，在《實業計劃》中，他才表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⁷孫中山的言論中，終於也出現了“獎勵”、“保護”私營經濟一類字眼，表明孫中山又一次考慮了他的批評者的意見，對中國經濟發展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在中國當時生產力十分落後的情況下，禁止一切私

1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23頁。
2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頁。
3 《孫中山選集》，第843頁。
4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15頁。
5 《孫中山選集》，第364頁。
6 《孫中山選集》，第369頁。
7 《孫中山選集》，第217頁。

人資本主義經濟是錯誤的。

也還必須指出，儘管孫中山承認了他應該承認的東西，但是，他仍然力圖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程度。1921年12月，他在桂林說：“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學俄國將資本家悉數掃除。”¹這一段話，和毛澤東1949年所講的一段話很類似。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說：“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²在對待資本主義的政策上，兩位被視為不同階級的革命家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結論，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國營（公營）、私營（民營）之間的優劣、主次、進退非常複雜。它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需要長時間的歷史檢驗才能回答的問題。但是，孫中山的理想和熱情貫注之處卻始終在國有經濟。他說：“蓋國家之設施，利益所及，仍為國民福利，非如少數人之壟斷，徒增長私人之經濟，而貧民之苦日甚也。”³因此，在許多場合，他給私人經濟留下的活動餘地很小，而且時時有戒心，害怕由此生出“大富”階級來。所以，就在《實業計劃》中，他又同時宣佈，他的工業革命計劃是：“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⁴由此不難想見，他的國有化的巨大規模。

在孫中山的思想中，國有制是遏制、防止私人資本主義禍害的力量，它的利潤是屬於人民的，因而是充滿民主主義色彩的。1922年12月，一個名叫約翰·白萊斯福特的記者和孫中山談話，認為國有企業“耗費而乏效能”，有許多弊病，孫中山則表示，“國家社會主義”確有缺點，但主要原因在於“經驗尚淺”，數十年後，問題自可解決。他說：“余以為為公共利益作工，不為私利作工，縱有上述之弊，亦為利重弊輕。”又說：“利害相權，吾終以為國有企業較勝於現時之私有制。”⁵儘管國有經濟、公有經濟，易於造成官僚化、行政化、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等頑疾，但是，孫中山對這些頑疾都視若無睹，或者根本

1 《孫中山全集》第6卷，28頁。“俄國”，原作“各國”，誤。
2 《毛澤東選集》第4卷，1483頁。
3 《孫中山全集》第2卷，338頁。
4 《孫中山選集》，第214、368頁。
5 《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634—637頁。

沒有思考，相反，他對私營經濟、民營經濟的靈活、機動和高效率的諸多優點卻毫無所述。可見，他左袒國有經濟、公有經濟的立場多麼堅定。一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會是這個模樣嗎？！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國有化，但國有化並不等於社會主義，關鍵在於國家的性質。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國有化的實質是國家資本主義；只有在國家獨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社會，國有化才是社會主義。對此，孫中山是有所理解的。他在批判清朝政府的鐵道國有政策時曾說：“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滿清政府之所謂國有，其害實較少數資本家為尤甚。”¹ 因此，他主張政治鬥爭優先於經濟鬥爭，“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² 這是一個相當深刻的思想。在孫中山看來，只有國家為人民之公產，政府符合“國民公意”，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有即民有，才是社會主義。

對資本主義，孫中山最先發現的是經濟制度的巨大禍害，後來，才逐漸認識到政治制度的缺陷，並且不斷深化，由政體而觸及國體。1912年5月，他在廣州演說時指出，美、法兩國的政治，“操之大資本家之手”。³ 6月，又指出：“英美立憲，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⁴ 因此，即使在辛亥革命時期，從主觀願望上說，孫中山也不希望建立資產階級專制的國家政權。正像他在經濟上企圖突破舊的民主革命的局限一樣，孫中山在政治上也企圖有所突破，這是他的偉大之處。十月革命後，1922年1月，他在桂林說：“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⁵ 這是他在國家問題上向舊世界告別的一個重要宣言。講話中，他甚至對工人管理國家持肯定態度。他說：“洪秀全建設太平天國，所行制度，當時所謂工人為國家管理，貨物為國家所有，即完全經濟革命主義，亦即俄國今日之均產主義。”⁶ 這裏，對太平天國的分析是不倫不類的，但一種新思想顯然在孕育中。

1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頁。
2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頁。
3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54頁。
4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71頁。
5 《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56頁。
6 《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56頁。

孫中山多年的探求和新思想的影響在“一大”宣言中得到總結。“一大”宣言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¹ 這一宣言明確無誤地顯示，孫中山所要代表的是“資產階級”之外的“一般平民”，所要建立的乃是與歐美不同的“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人民共和國。與此同時，“一大”宣言又將孫中山“大資本國有”及其有關思想概括為“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並列為民生主義的兩大原則。它聲稱：“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² 前浪後浪，波波相連。從舊三民主義到新三民主義是質的飛躍，同時也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一大”以後，孫中山在廣州市工人代表大會演說時，又以讚許的口氣說：“俄國工人在幾年以前結成大團體，推倒專制的沙皇，弄成工人的獨裁政治，無論什麼資本家都不許執政權，只有工人才可以管國事。”³ 雖然這時候，孫中山還弄不清楚蘇維埃政權和英國工黨內閣之間的實質區別，但顯然又在向新的思想高度邁進了。

毛澤東說過：“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⁴ 除了沒有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之外，孫中山晚年所設想的“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共和國與共產黨人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基本相同，因而這一共和國所實施的國有化也就不同於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它存在著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趨勢和可能。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人高度評價“節制資本”這一思想，稱之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方針”⁵。因為它既可以發揮資本主義有利於社會的一面，又使之不能操縱國計民生，便於防止其禍害，並轉入社會主義。

1 《孫中山選集》，第592頁。
2 《孫中山選集》，第593頁。
3 《孫中山選集》，第910頁。
4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1952年8月版，第649頁。
5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49頁。

四、中國革命特殊矛盾的產物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中國革命特殊矛盾的產物。

中國革命發生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比較尖銳的時代，它的各項弊病和痼疾得到充分暴露，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反資本主義思潮迅速流佈，工人運動日益發展。當孫中山面對這一現實時，不可能不產生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但是，中國革命又發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裏，經濟落後，資本主義還是新生事物，因而，這一革命的性質必然也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當孫中山面對這一現實時，他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一個徹底的反對資本主義的綱領，不可能也不應該幻想迅速建立一個純粹而又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節制資本”，既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一定規模上的發展，又對它的危害國計民生的方面有所限制，這是當時中國所能採取的唯一正確的方針。

人們可以指出，孫中山的理想並非科學社會主義，也可以說明他的“畢其功於一役”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在 20 世紀初年，當中國革命正在起步的時候，孫中山就勇敢地揭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症，認為中國不能再走歐美老路，革命應有新的特點，必須避免資本主義禍害，它的前途應該是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觀點。提出這一觀點是孫中山的歷史功績之一。

正確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特殊矛盾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說：“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¹又說：“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又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²人們仔細研究之後就會發現，上述觀點既揚棄了孫中山思想中的主觀空想成分，而又吸收了他思想中積極、合理的內核。中國革命正

1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655 頁。
2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619 頁。

是經過新民主主義這一特殊道路，“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¹，走向了社會主義。

附記：本文是作者提交 1986 年 11 月 12 日在翠亨村召開的“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原載《北京社會科學》1987 年第 1 期，收入《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中華書局，1989 年），後又收入《楊天石近代史文存·哲人與文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等書。現錄自《楊天石評說近代史·民初政局》，中國發展出版社 2015 年 9 月版。第三部分略有修訂。

1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621 頁。